

# 西方社会福利及其可持续发展路径探析<sup>\*</sup>

徐 延 辉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the understanding process of the developing road of social welfare in Western industrial society is analysed and commented from the aspects of economic sociology and developmental sociology. Firstly, we trace the changing process in the economists' and sociologists' minds on understanding how social change has effected social welfare. Secondly, we offer a new explanation on the meaning, nature and changing tendency of social welfare and make a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welfare and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y comparing the different ideas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e finally draw such a conclusion that it is urgent and unavoidable for social welfare to be developed in a sustainable way.

## 一、关于社会变迁对社会福利产生影响的认识

如何评价社会变迁对人类福利所产生的影响,人类应该采取何种态度或何种政策适应社会变迁以便增加人类的社会福利,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关系到对社会福利发展道路的选择。对此,欧美一些思想家从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出发,多角度地阐释了技术进步和社会变迁的正负影响,进而提出了解决当时存在的社会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1.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其鼻祖亚当·斯密开始即把经济学的目标定位于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增长的原因,物质福利的增长始终是经济学关注的核心。在古典经济学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符合人类本性和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一种自发的或自然的社会秩序,在没有人 为干预的情况下,自利的个人在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会不自觉地增进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因此古典经济学倡导自由放任,减少国家对经济事务的干预,主张把权力下放给厂商,使权力分散于整个社会。对古典经济学家而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人类对于这一变迁无需采取什么防治措施,个人和政府只要顺应时代潮流自由发展,即可实现个人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虽然产业革命和高效率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不到 100 年的时间里创造了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但这些财富并未像功利主义思想家们所期望的那样,增加“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是造成了极少数人的幸福和绝大多数人的痛苦。因此,以庇古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家在 20 世纪 20 年代第一次将财富的增长和财富的分配问题区别开来。庇古认为,影响一

<sup>\*</sup>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李坚教授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此深表感谢。

国经济福利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国民收入总量的多少；二是国民收入分配的均等化程度。这就意味着不仅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财富总量增长很重要，而且财富的分配对提高整个社会总体福利水平更重要。由此经济学家第一次将社会变迁的制度因素考虑到影响福利变动的因素当中，进而提出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方式，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实行收入转移，对生产行为造成负的外部性影响的企业进行征税，对生产具有正的外部性影响的企业进行补贴等一系列政策主张。他认为，实施上述收入调节措施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增加穷人的福利。庇古认为，增加同一单位的货币收入给穷人和富人带来的边际效用是不同的，因为穷人的总收入水平很低，因而增加一单位货币给穷人带来的效用要远远大于给富人的，因此把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转移给低收入者必然会增加穷人的满足程度，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二是增加社会的长远福利。庇古认为企业进行生产活动时不仅要花费私人成本，而且可能会花费社会成本，所产生的收益亦可包括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两部分。当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不一致时，政府就要采取干预行为。比如生产纸张的企业同时会产生严重的环境污染，这类企业的生产成本远远小于社会成本，也即社会为了治理污染而花费的成本远远大于企业本身的生产成本。庇古主张对这类企业征税以限制其生产活动，从而保证社会的持续发展。

在庇古之后，以帕累托为代表的新福利经济学家对包括旧福利经济学在内的正统经济学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新福利经济学所提出的“帕累托最优”和“社会福利函数”等理论成为西方政府制定价格、产量等微观政策以及收入分配、“福利国家”等宏观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新福利经济学家关于福利的思想和理念对西方工业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从总体上看，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主流经济学家对社会变迁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持赞许态度的，认为追求更高的利润和更丰富的物质财富的资本主义理想同时也是整个人类社会追求福利的理想。这种理念一直到60年代末米香提出“美好生活论”以后才有所改变。

2 社会学家关于社会变迁对社会福利所产生深远影响的认识与经济家的认识发展过程大体上是同步的。20世纪20年代以前古典变迁理论占据统治地位，以斯宾塞为代表的古典社会学家提出了意义深远的直线进化模式，该模式把社会发展看成是一种人类沿着可预见的阶段不断上升的过程。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要通过不断的分化过程实现技术、组织和道德的共同进步，未来是可以预见的，社会是在不断进步的。在肯定社会福利与社会变迁同步变动的同时，斯宾塞同亚当·斯密一样，强调个人的福利主要通过个人努力、通过市场交换来实现。反过来说，个人的福利如果没能得到改善，那主要是由于个人原因造成的，而与资本主义制度或社会变迁之类的宏观环境无关。

20世纪初期以后，由于经济上的垄断和政治上特殊利益集团对经济生活的控制能力不断强化，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扩大，这就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社会变迁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奥斯瓦尔德·施彭格勒于1918年首次提出了社会变迁的直线退化模式，对社会变迁提出了否定性价值评判，认为技术进步所造成的最终后果不是社会进步或社会日趋完美，而是社会秩序的严重破坏。为了弥补市场经济自由发展给那些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所造成的福利损失，工业化国家实施了一系列社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由于收入差距扩大所引发的紧张状态。但是，在马克斯·韦伯看来，这些政策措施正在向着官僚化的方向发展，制度化的社会政策正在变成凌驾于人类精神之上的正规统治架构的一部分，片面地追求物质福利损害了人的全面发展。

虽然在工业化全面深入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同时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和物质财富极大增

加的资本主义繁荣时代,仍有极少数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社会变迁的负面影响保持有限的异议和警醒,但是工业化及其所代表的福利前景如此美妙诱人,以致所有的疑虑和潜在的担忧都显得不合时宜而被人们忽略不计了。于是福利最大化统一成为整个社会的共同目标。

## 二、如何认识社会福利及其变动趋势

技术进步和社会变迁究竟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人类的福利,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判断取决于人们对福利的不同定义。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经济学尤其是福利经济学主要研究能够直接或间接用货币来衡量的物质福利或叫经济福利(well-being);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社会学尤其是发展社会学主要研究有益于人类全面发展、充分发挥人类潜能的社会福利(social welfare)。社会学所考察的福利概念是一个大概念,它既包括人均国民收入、人均医生拥有量、人均能源消耗量等物质福利,也包括人均教育水平、个人社会地位相对变化和社会价值实现程度以及整个社会持续发展的综合能力等精神福利。

如果从福利概念的第一个层次来考察,那么古典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目标及结论基本上是一致的:产业革命和技术进步的直接后果是物质福利的不断增长,社会福利变动趋势与社会现代化进程同步进行,现代化程度越高,用物质福利衡量的社会福利水平也越高。因此,那些最早开始工业化的国家,如英、法、德、芬兰、荷兰等国家福利水平最高;那些原为上述国家海外移民(或殖民)地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等国家的福利水平次之;而那些远离现代化中心,同时由于宗教信仰、社会意识、种族分离等社会因素人为阻止现代化进程的国家,比如埃塞俄比亚、塞拉利昂、阿富汗等国家福利水平最低。社会福利在全球的分布特征体现了现代化从其发源地向外传播的历程。

如果从福利概念的第二个层次来考察,那么社会学家得出的结论就不像经济学家那样乐观了。20世纪40年代,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先驱和缔造者贝弗里奇曾对英国工人在社会变迁中的社会地位做过详细调查,结果发现工人阶级在社会化大生产中所遭遇的风险不断扩大,而他们从社会迅速增长的物质福利中所获得的相对份额并未显著增加,他们在社会分层中的相对地位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在此调查基础上形成的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促使英国在40年代先后颁布6项有关社会保障的立法,目标就是缩小社会收入相对差距。

社会学家认为,尽管现代化的发展创造了空前的物质财富,但它同时也在不断地制造着新的贫困和新的忧患。新的贫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富国与穷国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二是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两个层次的贫困表现为一种相对贫困,也即在全球物质文明总体呈现上升趋势的前提下,社会福利并非均衡地表现为每个国家、每个公民的福利水平同比增加。相反,工业化所造成的更普遍的后果是“剥夺福利”(diswelfare)。从工业化过程中受益最大的只是拥有社会稀缺资源的少数发达国家和少数社会群体。

现代化所引起的新的忧患表现为生活质量的下降和社会福利持续发展的路径受阻。从20世纪60年代起,人们开始反思经济增长的含义以及追求高速增长所付出的代价。以倡导回归“田园式”生活方式而闻名的米香认为,人们为了追求更丰富的物质享受而付出的社会文化代价太大了,高速增长所带来的收益远不及由此带来的损失。因为人类的需要是多元的,物质享受只是其中一部分,享受自然、拥有安全感和自尊感的精神享受更为重要。在米香看来,由于技术进步和人们盲目追求物质福利已使西方社会普遍出现消费过度,衣食住行的消费水平远远超过实际需要,而人们的生活质量、精神状态和社会生态环境却在不断下降。因此,米

香憎恨技术进步,认为技术越进步,如人们所期望的更便捷的旅行、更丰富的娱乐节目以及更无时空限制的方便购物等等,都使人们从对人的依赖转移到对机器和能源的依赖,都在不自觉地改变着人们之间相互交往和相互沟通的方式,结果是使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不断扩大。

虽然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在米香看来是不可取的,但由于人类所具有的趋利本性和懒惰天性决定了人们对于利润和舒适品的需求是无止境的,因而技术进步和现代化的脚步是不可阻挡的。人类对于自然资源的无节制的开采产生了另一个福利忧患:人类正在为了满足当前的福利而透支未来福利,福利的后续发展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威胁,因而社会福利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于20世纪70年代被正式提到议程上来。

### 三、社会福利与可持续发展路径选择

可持续发展理论一般被认为是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关于人类社会如何发展的一种新的思想和观念。而实际上,我们可以把这一思想追溯到一个半世纪以前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中。当时马尔萨斯认为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粮食以算术级数增长,如果不对人口增长采取有效措施,则人口增长超过食物增长,人与自然不能共存。100多年以后,罗马俱乐部邀请当时知名的企业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聚集在一起,编制出当时最先进、最复杂的全球系统模型。该模型认为,人口增长、粮食供应、资本投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是影响经济增长和人类生存的5个主要因素,这5个因素的共同特点有两个:一是其增长速度都呈现出指数增长特征,每种要素增长一倍所需要的时间越来越短;二是5种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如人口增长离不开粮食供应增长,在可耕地数量既定的情况下,增加粮食产量需要增加农业资本和工业资本投资,更多的投资需要消耗更多的资源,废弃的资源增加了环境污染,严重的污染反过来又限制了人口增长和粮食增长。因此,如果不对人口增长、生产增长、资源的消耗速度以及环境污染的速度和程度及时加以控制,那么地球很快就会由于资源危机而崩溃。这个模型因其结论危言耸听又被叫做“世界末日模型”,同时因其结论与马尔萨斯的结论如出一辙,模型的主要缔造者福雷斯特(Forester)和米都斯(Meadows)等人也被称为“新马尔萨斯主义者”或者是“带着计算机的马尔萨斯”。

新马尔萨斯主义者的理论虽然引起了一场广泛争论,但人们对它的评价完全不同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人们对它的态度是毁誉参半。因为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现代化和巨大的社会变迁,现代化的负效应经过长期积累,尤其经过20世纪50—60年代资本主义高速发展而成为人类福利增长的巨大消蚀力量。因此,到1972年“世界末日模型”公布于世的时候,它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其结论的震撼人心力量,而更主要的是它所引发的全世界对于经济增长的限制条件、自然资源的承受能力、社会福利的本质含义等许多问题的深刻思考。甚至知识经济概念及其相关理论也可以被看作是这场大讨论的思想副产品,因为那时人们已经认识到经济增长的方式需要从“高体积转向高价值”。由经济增长方式所引发的这些思考为80年代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正式提出奠定了广泛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准备。现在人们从多学科、多角度探讨和使用可持续发展概念,从而使这一概念得到空前发展。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定义已有100多种(范柏乃等,1998)。

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核心是人的长期发展以及社会福利在几代人中间都能得到社会保证。戴利认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目标是在尽可能长的人类生存时间内,保证最大多数人的基本生活。为达到这一目标,必须对人口增长、人均消费以及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速度进行控制。戴

利的思想同功利主义哲学所倡导的“保证社会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思想不谋而合。另一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代表人物布伦特兰认为,发展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能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这一思想类似于帕累托的最优思想:在不减少后代人福利的条件下,增加当代人的福利,其目标是保证资源和福利在代际之间实现公平分配。因此,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可以归结为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将资源和福利在当代人和几代人之间实现最优分配,以便实现当代人一生效用最大化和几代人效用最大化。

人类追求幸福的欲望是无止境的,现代化的飞速发展是人类实现欲望提供了充分的技术保证。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类在满足欲望的时间分配上,具有严重的偏好当前消费、忽视未来消费的倾向,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而人们是不愿意对不确定的事物寄予厚望的,因而人类具有普遍的“现状偏好”倾向(Rabin, 1998)。如果对人类追求福利的手段及时间分配不加以限制,那么追逐最大利润的厂商就会不顾一切地滥用资源,直到把地球啃光挖尽为止,直到地球以破坏性甚至伤害性资源供给威胁到当代人自身生存的时候为止。因此,可持续发展问题实质上是人类追求福利的道路选择问题,也是人类对于自由竞争和国家管制是否结合以及如何结合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问题。鉴于自由竞争和自发的经济行为为人类的长远福利和持续发展带来严重的负的外部性影响,以路德维希·艾哈德为代表的、倡导国家干预和自由竞争相结合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重放光彩。

#### 四、可持续发展:离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还有多远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人类追求福利满足的长期化、代际化及全球化设计已在发达国家取得广泛共识,发达国家甚至出现少量先驱者信奉纯粹生态学思想,并把这一理念付诸实践活动。不同国家对社会变迁和社会福利的道路选择是价值观念问题。是自发地追求福利并允许社会自发地变迁,还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追求福利并控制社会变迁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也许是发达国家已经经历了工业化的辉煌,同时也饱受环境污染、资源破坏和过度城市化等各种工业化痛苦,因此,率先进入物质文明的国家已经开始实施有计划的社会变迁。比如走在信息时代最前列的芬兰,其因特网普及率和移动电话普及率均居世界第一。领先的科技改变了芬兰人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极大地提高了芬兰人的工作效率和生活福利。但是,芬兰人认为科技只是一个好仆人,而人才是这个社会的主人。因此,追求更高科技和更富裕的生活水平并未改变芬兰人对大自然的热爱,花草树木被视为城市的“肺”而倍受珍视,芬兰的森林覆盖率始终位居世界前列。

而发展中国家因为一切都在发展中,生产、技术、教育和环保意识离工业化发达国家的相关水平距离很远,离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距离则更远。很多国家尚未跳出贫困的陷阱,很多人尚为果腹而忙碌。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使大量森林资源被破坏,过度城市化造成城市交通拥挤、环境污染、地下水枯竭。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历程正在发展中国家重演。面对工业化和商业化的强大力量,作为个体的家庭和企业是无能为力的,而作为宏观的国家或政府是有力量进行社会发展规划的。问题在于国家或政府也是由具有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人和集团组成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发展中国家人民所共有的偏好和短视。因此,在现阶段,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变迁仍以自发的变迁为主,以加速自然资源的开采和高速度的经济增长的“有计划的”变迁为辅。这种变迁方式将对发展中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福利的长期满足产生许多无可挽回的消极影响。在此,我们仅以辽宁省沈阳市为例,说明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在社会福利

和环保意识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

辽宁省作为老工业基地曾为中国工业化建设做出过重大贡献,即使在最近几年因为经济体制转轨而使其经济增长速度减慢,辽宁省的社会综合发展水平也仍然位居全国前列。但是,即使在这样一个综合素质(包括人均教育水平、信息指数、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各项指标在内的综合水平)颇高的省份,其环境意识也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目前辽宁省正同欧盟合作一项综合环境项目,这项历时5年、耗资巨大并由欧盟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的、欧盟在中国进行的最大的环境项目包括公众环境意识、城市规划、水资源管理、能力建设和空气质量管理、能源管理、清洁生产和工业结构调整等7个子项目。目前项目的调查研究虽然刚刚启步,但欧盟专家提供的原始信息却令我们异常惊讶:十几年以前,欧洲人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与我们现在的认识相差无几,大多数人认为随着技术进步和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环境问题自然可以得到解决,也即环境法规和改善环境的技术是最重要的。但是,现在欧洲人认为环境意识最重要,因而把“公众环境意识调查”置于7个子项目之首。而让欧洲人对环境的认识发生重大转变的正是中国,更具体地说是中国的辽宁省。欧盟专家发现,目前中国有三条污染最严重的河流即淮河、海河和辽河,其中又以辽河污染最严重。而恰恰是污染最严重的辽河所在地辽宁省最先颁布了大量的环境保护法规。结果怎么样呢?10年过去了,辽河依然是中国污染最严重的河。由此可以认为,环境意识决定环境质量,而以经济福利为中心的社会福利意识又决定了环境意识。落后于时代潮流的福利意识最终降低了全体人民的福利水平,并迫使我们不得不花费更大的社会成本来治理这些不断积累和不断扩散的环境污染。

那么,如何才能既保持社会福利的持续发展,同时又不对后代人的福利增长构成威胁呢?觉醒的辽宁省正在实行的“三同时”政策即设计、生产和环境治理同时进行的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限制在最小范围内。在现阶段,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生产关系、组织方式、社会意识等各个方面的深刻变革。在这场无声的变革中,个人在社会中的相对地位,中国在世界上的相对地位都要重新定位。如何选择社会发展道路必将对当代中国人和未来几代中国人的社会福利产生深远的影响,可持续发展道路为我们实现社会福利理想提供了一条科学的线索。

参考文献:

范柏乃、马庆国,1998,《国际可持续发展理论综述》,《经济学动态》第8期。

卡普洛,1997,《美国社会发展趋势》,商务印书馆。

马歇尔,1997,《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威廉兰格·威谢,2000,《伊甸园:一个封闭的社区》,《编译参考》第1期。

郑杭生,1999,《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周弘,1998,《福利的解析》,上海远东出版社。

Rabin, M. 1998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36.

Neef, D. 1998 *The Knowledge Economy*, Robert Reich, “From High Volume to High Value.” Butter worth-Heinemann.

Wilber, C. 1998, *Economics, 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Row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作者系沈阳师范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生  
责任编辑:张志敏